

受降前後

鈕 先 銘

本年八月一日，日本九州盛大舉行對我 總統蔣公的感恩會，感謝 蔣總統在民國三十四年中日戰後，對待戰敗國日本採取以德報怨的寬大政策。光陰荏苒，抗戰勝利迄今已歷二十六年，緬懷民國三十四年八月日本投降，失土重光，此一空前未有的燦爛光輝紀念，猶然令人黯然神往。鈕先銘將軍當年担任中國陸軍總司令部高級幕僚，從八月六日第一顆原子彈在廣島爆炸，以迄九月九日舉行於我首都的受降典禮，鈕將軍或最早獲得情報，或身歷其境躬逢其盛，因此中外雜誌特請鈕將軍撰寫「受降前後」一文，存此第一手之珍貴史料。

—— 編 者

鄭介民聲東擊西

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六日，第一顆原子彈拋在廣島以後，駐昆明美軍司令部的參謀長柏德諾將軍，曾到中國陸軍總司令部來說明投擲原子彈的經過。當時我們這一羣中國陸軍總司令部的同事，除了聽到一次科學式的封神榜神話以外，最使我們直覺的，便是對於戰爭指導的方案，必須馬上有所修正。七日下午昆明掃蕩報的負責人，要我寫一篇關於原子彈的文章，但是被我拒絕了，因為我對於原子彈可以說是沒有絲毫的知識；可是我却為掃蕩報寫了另外一篇文章，說明戰爭已

近末期，勝利的曙光，業已在望。沒想到日本的投降，竟在三數日以後，兌現會有如此之快。

一九四二年春夏之間，正是日軍席捲太平洋的時候，同時在中國戰場也發動了浙贛路會戰，是東條英機不可一世的時代。當時筆者是軍令部主管太平洋情報的參謀，爲了五月的珊瑚海及六月中旬的中途島之戰，曾寫了一篇爲日本洩氣的文章，說日本的軍事行動已經到達了頂點，這是戰爭的畫期分野線，此後將走下坡路了。

同年的十一月間，日本成立了軍需省（部），將飛機製造改爲一元化，預計在一九四三年的三月，達成月產三千架的預定。筆者又寫了一篇「倭寇在戰術思想上的錯誤」，以說明日本的必

敗。日本是一個島國，珍珠港事件是以海空軍爲主體的；而日本對於海空軍並沒有十分的着力，僅以武士道的精神，誤認陸軍爲萬能，遲到中日戰的第六年，太平洋戰的第二年，才開始整理航空製造業，英文有句俗話說：miss the bus，這樣的落後，焉有不敗之理。

中國陸軍總司令部，成立於戰爭的後期；爲了配合盟軍作戰和區分作戰地區起見，故冠有中國兩個字。不僅與現行之陸總的組織與任務有所不同，而且是直接指導作戰的；當時的參謀總長何敬之上將便兼任總司令。在滇緬路打通而西南的戰事獲得局部的勝利以後，作戰的重點是指向廣州。理由也非常的簡單，當時在太平洋上的美

軍，以逐島和越島的方式在北進；中國戰區的部隊，為配合太平洋盟軍的進展，若能推進到廣州，不僅使中美兩國的部隊可以打成一片，而且如獲得一個海港，武器的補給線，也可獲得捷徑。

那時還有一段插曲值得我們回憶的，當年在廣州地區的敵軍兵力是三個師團四個旅團和一個香港防衛隊，總兵力靠近十萬以上。這樣大的敵軍，預想到我們的攻擊是相當棘手的，所以當時的第二廳（情報）廳長鄭介民將軍，還使用了一次情報的謀略。故事是這樣的：他故意用比較容易破密的密碼，打了一個密電給麥克阿瑟總部，說將派王俊將軍（現任立法委員）率領海南島籍的中級軍官一百名到太平洋總部去受訓。這個密電，日軍當然很快就破密了；他們的判斷，美軍必攻海南，因此才會教中國海南島籍的軍官去受訓；所以便將駐廣州的部隊，調了兩個旅到海南島去。這樣的情報謀略，使用了調虎離山之計，很輕易的便減少了廣州地區當面的敵軍。這段秘聞，迄今知道的人還很少，也是已故鄭介民上將在情報上策略運用的傑作，是很值得我們的追憶和敬仰的。

中國陸軍總司令部的反攻部隊已經克復了桂林，總部的一部推進到了柳州，何敬公正在南寧前方督戰，而突然的獲得了日本投降的消息，我們便打了一電報請敬公同昆明來領導一個新的局勢。記得是八月十四日下午二時，敬公從飛機下來，還沒有吃午飯，便在他的行邸裏召集了一個非正式的幹部會議。

中國陸軍總部是三十三年底桂柳會戰時而奉

命成立的。經過了半年的苦戰，從湘西會戰一直到桂柳克復，都是在第一線的先端和敵軍奮鬥。日軍這一下子投降了，中心當然在南京北平和武漢，而我們却處在西南的一角，不免有落後之感，所以在幹部會議席上，大家都是喜懼交集。我是主管敵情的幕僚，在我報告了一般的敵軍態勢之後，附帶說明了受降不是遠近的問題，而是在沒有交通工具？我們必須將精銳的部隊，迅速的運到收復區裏；第一是要鎮壓投降後的動亂，第二是要維護淪陷區的治安。在西南區裏我們有一萬五千輛卡車，和盟軍一個空運部隊，這都是我們推進的工具。最後的決策當然在重慶的首腦部，所以敬公就飛回陪都去了。

芷江受降幾支插曲

當時最高統帥蔣公用廣播對敵將岡村寧次所下的第一道訓令，所指定的洽降地點是江西玉山，有一度傳說在桂林，最後決定在湖南的芷江。於是我們便隨着參謀長蕭毅肅將軍飛往芷江。我不詳其理由，在我想第一是因為芷江有極大的空運基地，第二是有大軍雲集，可以機動使用，使這個湘西的小縣，一躍而為歷史上的名城。

日軍的總參謀副長今井武夫少將飛到芷江的日期，是八月二十一日的上午十一時，偕行的有情報參謀橋島中佐和幾位隨員。主持洽降的是蕭毅肅參謀長，將第一號備忘錄交給今井，內容是指示岡村如何佈置投降的事宜。正本是中文的，附有一件日文的副本，由王武上校筆譯。當時找

不着人會寫日本的小楷，恰好我處裏有一位台灣籍的書記叫黃金發，他是從緬甸戰役中由日軍逃回來的，他用了一夜的功夫抄寫那個副本。日本投降後第一道公文日文副本，竟出諸一位台籍同胞之手，這是值得我們大書而特書的。黃金發同志退役後，一直在宜蘭的家鄉營商，到最近幾年才和我失去連絡。

今井少將是一位中國通，戰前就做過駐中國的武官，不過不像高橋坦酒井隆那樣的橫蠻。我和他第一次會談的任務是校正日本軍隊的番號駐地和主管姓名。我們既有的情報資料和他所攜來的文件相對照，竟符合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，這倒使今井大吃一驚，他說：

「我沒有想到貴國的情報，有如此的正確，真使我感佩交并。」

「戰爭打久了，好像打成了一家人一樣。」我很輕鬆的回答他。當然我不願意告訴他，我們為什麼會有如此的正確。

受降的區域是包括在越南北部的日軍第三十八軍，因為超出了岡村統轄的範圍，所以今井表示他不太清楚那邊的情況。我便問他同來的橋島中佐，論日本士官學校的期別，橋島和我是同期的同學，不過兵科不同，而事隔多年，同期的人數也很多，所以我們并不認識。當我向橋島詢問的時候。今井插嘴說：

「橋島是管情報，正和閣下主管日軍情報一樣，他對貴軍的動態也許相當的熟悉，對本軍反而不太清楚。」

今井說了這句以後，自己覺得相當的失言，

倒不是因為他是敗軍之將，用太平等的語氣和我交談，而是他洩露了橋島的身份，怕我會逼橋島供出搜集我方情報的方法。所以在三天以後，今井一行回到南京，便以生病的理由，先將橋島遣回日本，從那以後我便沒有再見過橋島的面。

可是今井并不示弱，他也誇耀了一下他們情報的正確。他突然問我：

「閣下的前任情報處長，是不是金鎮中將？」

這也使我一覺，因為金鎮中當過兩個月的情報處長，而他已有所探悉。日本軍對於中國方面的情報，是下過苦功的，只是沒有計劃到中國能打八年仗，這是犯了見樹不見林的毛病。當今井對我提出了這句反擊，我馬上想到一位偉大的軍界前輩蔣百里先生：蔣先生有一篇遺作叫做：「一個外國人眼裏的日本人」，曾說到日本人是明察秋毫而不見與薪。

「敗也好，勝也好，總不和他講和。」這是百里先生的遺訓，在抗戰初期，蔣先生就有這樣遠大的眼光，真是萬世不朽的格言。

我當時急切想知道的是廣島的情形，當然這與受降的事務并不太關連，可是過去我在廣島讀過書，所以我對廣島留了一份感情，其次是對原子彈有一種強烈的好奇心理。當我發現橋島的家鄉是廣島，我便沒有再探問：戰爭敗了，家鄉又受了原子彈的洗禮，我對於這位同期的同學，深表同情。

今井一行在芷江一共住了三天，洽降的儀式非常的簡單，由蕭毅公主持的。在臨行前何總座

召見了一次今井，敬公坐在一張辦公桌的後面；再後面站了五個人，參謀長蕭公為首，左右是冷蓉庵和蔡定武兩將軍，再其次是美軍參謀長柏德諾將軍和我。柏德諾將軍便是爾後韓戰時的俘虜營司令官，韓戰中我負了某種任務到韓國去的時候也順便找過他，但是他多方的避而不見。這位當年受降的伙伴，却在俘虜營裏為戰虜所劫持，丟過一次大險，我是又氣又為他可惜。

何總司令對今井的召見也很簡單，第一是問他對參謀長所付與的文件是否完全了解？第二是教他轉告岡村寧次要絕對遵守命令，今井便帶了五道訓令式的文件飛回南京。

九月八日上午九時，何敬公乘美齡號專機由芷江飛往首都，隨從人員除我以外，還有幾位幕僚。美齡號是四個發動機的DC-4，在當時是性能最高的旅遊機，在座機的四週還有八架P-51護航；P-51比DC-4的速度要快上一倍，所以就來回上下左右的圍繞着座機飛翔，在秋高氣爽萬里晴空確實蔚為壯觀。

航程約為四個小時，一路上在機中我們並沒有休息，一直在準備一切應作的幕僚作業。敬公總座突然的問我：

「空運的新六軍，到達南京的有多少？」
「報告總司令，截至今早為止一共是三千零一點人。」

敬公聽了我的報告以後，並沒有再垂詢什麼？但是却繃了繃眉頭，似乎表示空運的先遣部隊，實在是太微乎其微。當時最大的運輸機是C-46，全副武裝兵連同必攜的器材每機最多只

能運三十人，所以三千部隊與器材已經在一百架次以上；機場和裝卸的設備，這已是最大的限度。可是當時在南京週邊的日軍却有七萬左右，和我們的先遣部隊實在不成比例，頗有單刀赴會之概。好在我們不是去比武，而是去受降，岡村寧次畢竟絕對服從了八月十五日我最高統帥電令的六項原則，其中的第三項是：「軍事行動停止後，日軍可暫保有其武裝與裝備，保持現在態勢，並維持所在地之秩序及交通，聽候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之命令。」

在機中我又將日軍的態勢重複的向總司令報告了一次。

「下機後，你立即與岡村總部去取連絡，告訴他關於明天受降的儀式和必須注意的事項。」總司令這樣的指示我。

「關於總司令的指示，事前已有詳細的電報，由冷副參謀長和陳昭凱科長轉致岡村總部。」我停了一停繼續的報告說：

「先銘向總司令有一個請求，便是下機後給一小時的事假，先到鷄鳴寺去一次。」

押來陳公博情婦

二十六年冬南京的保衛戰，我是桂率真將軍麾下的工兵營長，據守着戰況最烈的光華門。由於不及隨大軍撤退，展轉隱居在鷄鳴寺裏做了八個月的假和尚；在二十七年八月一日——八一三週年紀念的前二天，一襲僧衣我才逃到了孤島的上海，隨即轉香港回到後方，重新參加抗戰的陣

營。在別離鷄鳴寺的瞬間，我跪在觀音大士的殿前發過誓：戰勝回來的時候，第一要先到鷄鳴寺去參拜。這一段經歷，在整個的抗戰史中，真是微不足道；正和馬雷克的——西線無戰事——一樣。可是在我個人，那是平生最值得追憶的一件，敬公是很清楚的，所以他老人家，微笑的點點頭，批准了我的事假。

我之受知於敬公的也許與這件事情有關。三十二年我正任二廳的敵情科長，八月隨 委員長蔣公去西安的王曲開軍事會議，因一件並不重要的情報，我涉嫌洩露機密。敬公正在參謀總長的任內，便召見當時的二廳廳長楊樸園提督（海軍也），多少有幾句責難。

「鈕科長若是肯當漢奸的話，現在應當是汪精衛僑府的第二廳廳長，不會做我楊宜城的參謀。」樸老理直氣壯的爲我辯護，隨即將我做過八個月和尙的經過，報告了總長。

調查的結果，情報並沒有洩露，也洗清了我的嫌疑；并蒙敬公總長召見，獲得了一次最高榮譽的慰問。所以敬公出主陸總，即調我主管情報。

我平生敬佩的長官很多，但最使我景崇的却是楊樸園先生，我對楊先生的感激和懷念，無日敢忘。

一小時的事假，使我得重拜鷄鳴，正如陳露士先生爲該寺所寫的對聯：風景不殊人已往，江山無恙我重來。站在景陽樓上，俯覽台城，真不勝感慨系之。

受降的典禮，是在九月九日九時九分舉行的

，而降書的條款也正好九條。典禮嚴肅而簡單，只費了幾分鐘的時間。

在國際的慣例，任何一件條約的簽署，簽署人必將條款仔細的讀閱一遍，雖然事前已經詳研過它的內容。在米蘇里號軍艦上的簽降，重光葵也是這樣做的。可是岡村寧次却没有如法泡製；他舉起了老花眼鏡戴上，很快的就簽字蓋章。事後有人在閒談中詢問過岡村，他說：

「仗都打敗了，教我怎樣的簽我就怎樣的簽，這就是無條件投降。」

這真是說明了投降將軍當時的心境。

受降典禮雖然只費了很短的時間，善後的工作却大不易。繳械的武器裝備不計外，僅就遺俘的工作，日俘就有一百二十五萬，日僑七十八萬；此外還有韓僑約六萬五千，同胞被逼而盲從的四萬四千多人。從三十四年八九月開始到三十五年六月底才完成。

陸總二處原編制很小，爲了接受受降的工作，我們網羅了許多留日學生，尤以日本士官學校畢業的爲主幹。因爲日方的正式軍官，無不出身於士官，誼屬同學，語言相通，協調還相當的和諧，這當然是格遵最高領袖 蔣公以德報怨的訓示。所以在公事上雖不敢有一點苟且，可是在私人的對待上却相當的平等，從沒有用勝利者的姿態來盛氣凌人。在無數的接觸中，我記得只向岡村總部的人發過一次脾氣，那便是爲了陳公博事

件。

在今井離芷江回京的時候，我們一再指示，不得讓偽酋陳公博逃亡，可是等我們一到南京，

而岡村已縱之飛往日本。這種陽奉陰違的事實，焉得不使我們火冒三丈？正當我發脾氣的時候，小笠原清——這個曾經担任過東條英機的機要參謀，一位優秀的軍人，突然立正對我說：

「我們日本最大的罪惡，是和中國打了仗，至於放走陳公博不過是其中的末節而已；我們爲了對陳某的道義，不得不如此的作法，這是出諸於我的主張，假設論罪的話，我當刀釜不辭。」他深深的鞠了一個躬，然後繼續的說：「希特勒、墨索里尼，都是死無葬身之地，陳公博現在是在戰敗國的日本，隨時可聽命逮捕歸案，我所要求於閣下的，是各盡其心各盡其責而已。」

陳公博的放走，當然經過岡村總部的慎重考慮，小笠原的挺身而出，僅不過期其一人担当而已。我倒很欣賞小笠原這種個人的作風，但是却懷疑如何能逮捕歸案，結果真是派了一架飛機而將人犯捉了回來，

當人犯押解到了總部，我真是高興的得意忘形，一口氣跑到樓上的長官辦公室裏，報告了參謀長，并從窗子向下指着一個女性，連陳犯的情婦莫國康也一併的押了回來。

「你拿那個女人也弄回來幹啥？」長官拍着桌子罵我，真使我嚇出一身冷汗。可是接着長官就說明了我們的政策，對於漢字輩的哥兒們，只要在有可原的情形下，也是採取從寬處分的原则。罪不及妻孥，只要與政治無關，何不網開一面？長官處理漢奸的苦心，也是情法并重，莫國康之自投羅網，倒是不好辦。

青山不幸埋此奸骨

從陳公博我們不能不聯想到汪精衛，這個始作俑者，幸而短命死矣，總算得免去了一刀。可是他所葬身的梅花山，却是青山不幸，埋此奸骨；所以有一幫氣兒粗的小老弟們，永不甘心，就用了幾個黃色藥包，將他的墳炸了。死有餘辜，倒也大快人心，縱使事前沒有呈報備案，也只好置之一笑。

記得是一個嚴冬的傍晚，走了四十幾天水路，行裝甫卸。當時從重慶還都是大事一件，兼之長江水枯，所以就擱了如此一段長的時期。我們正在整理舊居，樓下忽報客至，還不容許我請教姓名，這位年輕的女客便號啕大哭，大哭大叫，真叫我丈二和尚，摸不着頭腦。仔細一聽，原來是汪精衛的小姐，此行是專誠來與問罪之師；因為當時有關於漢奸的案件，也歸我這一處作業。

當時我很冷靜，對這個無理取鬧的女孩子，沒有作正面的衝突。在她高潮過去以後，我燃了一支香煙很平靜的向她說：

「妳是不是有一位令兄在歐洲，記得我留學的時候有過一面之雅；不過我對他的印象很壞。他想買一部汽車，問人家希特勒是坐的什麼牌子？結果他買了一部和希特勒一模一樣的『奔馳』，所以我覺得他有點作威作福。」我吸了一口煙，繼續的提高聲音說：

「今晚我見着妳，我很欽佩，欽佩的是妳敢到我家裏來無理取鬧有膽量。」我將大手指趨了

一翹，接着說：

「可惜你不懂得大義滅親這幾個字，但是愚忠愚孝也是值得頌揚的。小姐！我要問妳，我鈕家和你們汪家又沒有私仇。我為什麼要掘妳的祖墳？妳好生想想看。」

總算給我說服了，才平靜的送出了大門；可是一回到樓上，太太的臉却拉得比驢子還長。當然她以為小別數月，我鬧了桃色事件，所以女人打上門來。

「太太：這不是桃色事件，而是梅花事件。」

接着我將汪精衛的鞭屍經過，輕鬆的告訴了我的太太；可是她還是耿耿於心，她問我：

「這種無理取鬧，你為什麼不叫人趕她出去？」

「啊呀！從某一個角度去看，人總有她私人的氣憤的，我就當她一次出氣筒罷！不就完了？」

「這是我的答覆。」

後來聽說這位小姐當了修女，假設她對上帝是終身不變的話，倒比她晚節不全的父親高一着？在炸肅親王的當年，汪精衛何嘗不是一條好漢？政見不同，自古有之，認賊作父，則品斯下矣，可惜他不更早一點死。

分區受降，一共分十五個地區，每區除由當地的軍事長官主持外，敬公總司令也必蒞臨視察一次，而每次都有我隨行；還有幾件趣事是值得回憶的。

我們到達杭州是舊曆的八月十五，正值中秋佳節，在一連串的公式會議與儀式之後，晚間，

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墨公上將在行邸裏舉行了一次小型的晚會。在酒酣之際，在座的美軍駐華作戰司令官麥克魯將軍，（戰後曾任琉球軍政長官），忽然提議要遊西湖。當時已近午夜，大家都疲勞不堪，敬公墨公當然不願意去披星戴月，又不便太拂這位貴賓的雅興，只好請杭州市長周象賢先生去陪伴，同行的指定了我和一位英語甚佳的汪敬熙中校。

浩月當空，荷香四溢，雖已過午夜，而遊人如織。聽說這是八年來第一次開放，因為抗戰中有我游擊隊出沒，所以為日軍所禁止。

我們在三潭印月乘舟登陸，我正記憶着彭玉麟先生的佳作。

記故鄉亦有仙潭，看一樣湖光，添得石橋長九曲；到此地宜諳明月，問誰家秋思，吹殘玉笛到三更。

麥克魯將軍忽然看見一對青年的夫婦，他打出那帶酒味的英語說：

「中國朋友，勝利了，為了慶祝，我請你們一道去遊湖。」

慶祝勝利，又逢佳節，與民同樂，本是應有的豪興；可是中國人很拘謹，又不懂洋文，真使那對夫婦嚇了一跳。幸好有周先生在場。他對他們說：

「我是市長周象賢，你們當然認識，這個是美軍的司令官，想請你們一道去遊湖。」

經過了周市長的說明，那對夫婦才欣然同行。在泛舟間，我們一同喝着麥克魯所帶的「蘇奔」威士忌，才知道那對夫婦是新婚燕爾，可以說

是喜事重重。在東方作魚肚白的時候我們才登陸，那位新娘太太握着麥克魯將軍的手說：

「這是我一生最高的榮幸。」

這一幕喜劇，却使我捏了一把大汗，最初我怕新夫婦拒絕，得罪了貴賓；上船後我又怕洋將軍來一套洋禮兒，得罪了我們的老百姓。其有始有終而獲得歡愉的，當然是象賢先生的德政。來台後每與周先生相遇，必重憶往事，惜象賢先生遽歸道山，不勝哀悼。

日本戰略思想的錯誤

我們到越南大概是十一月間，因為受降僅限於北緯十六度以北地區，雖然名為三十八軍，却僅有二萬多日俘。可是因為超出了中國地區以外，所以我們對之却非常的慎重。越北與滇桂接壤，受降的部隊是由雲南派去的，一部份工作人員出之於廣西。

已故的越共頭子胡志明，抗戰中便在我們廣西工作，一旦勝利，當然兼程趕回越南。他為了表現他的力量，曾經在河內發動了五萬人的遊行，使敬公及我們一行人，在烈日下站了五個鐘頭去檢閱。以我的判斷，若不是共匪的赤流泛濫於中國大陸，那個瘦皮的山羊，是不會投共的。

保大那時也在河內，還來晉謁過敬公。雖然年紀很輕，以外型來看，倒還相當的穩健。敬公因為雲南龍雲事件的突發，臨時縮短了日程，決定飛昆明去處理。在起飛的前二小時，敬公垂詢我有否未完的工作，我當時申述意見，應當訪問一次保大。當然以敬公的身份，并不需要親自出

馬，所以以陸總幕僚的資格，向保大作了一次禮貌上的回拜。我們談了兩個小時，對當前的局勢，交換了一次廣泛的意見。保大發言雖然相當的保留，可是還十分的開誠，所以那一次會談，使我相當的滿意。可惜這位末代的君王，讀書太少，懦弱無能，只合於在巴黎的舞場中建立他的王朝，沒有幾年又搞垮了；真是扶不起的劉阿斗。爲了我和保大的會談，敬公還在機場上等了我一個小時，當時我還非常的得意，現在回潮起來反覺得值不得。

敬公到北平是深秋，受降的工作，已初就緒；此行主要目的，是在如何部署應付當前的環境；土共的部隊在近郊的西山，僅隔四十華里。若沒有翌年軍調部的成立，我想北方的情形不會糟到那樣的田地。

日俘華北軍司令官是根本博中將，全部的本軍官，在實施他們侵略政策的時候，當然沒有一個好東西。可是根本博却比較是穩重一點的，我認識他遠在民國十八九年的時代，他還是中佐，所以受降之時倒不是第一次見面。

總司令當然交付了許多的任務指示我和根本博去談判，其中之一的便是要他交出酒井隆來。這個敵酋，過去在中國是無惡不作，可是在日本投降之時，他並沒有負任何的職責，却在暗中策動日俘附匪，所以我們要限期的逮捕他。

根本博倒還服從命令，記得酒井隆起解到南京是聖誕節晚間的八九點鐘，我正要離開辦公室去參加一個晚宴，而那個討厭的東西解到了，使我不得不延長辦公來處理他的收押，我當時想

，一個討厭的人，在做階下囚的時候，都會給人討厭；酒井隆終於明正典刑，作惡的人決沒有好報。

根本博前些年曾幾度來台，爲的是做台灣筍乾出口生意；這個當年的猛將，已老邁龍鍾，連說話都會打瞌睡。前歲我漫遊東京，因爲是老朋友，所以約他在他的公司裏見面，可是到時候他沒有來；聽說是爲了酒醉而就誤了時間。美人名將，不許白頭，真使我無限的傷感。

受降是三十四年的九月九日，而工作處理完竣却在三十五年的六月底，最後離開中國的高級日俘，恐怕要算是今井武夫少將。那時中國陸軍總司令部早已改組，敬公上將出使駐聯合國軍事代表團的首席代表，我則從北平的軍調部調回二廳三處。因爲受降當時的機構已不復存在，所以今井的辭行，是到我私人的住宅去的。

倉促間我無以爲贈，除了送他一個圖章外，我還贈了一首送別詩：

芳艸遊踪遠，春風故國多；此般歸去也，多看舊山河。

不打成交情，我對今井個人是相當欽佩的，也可以說包括了岡村總部一批優秀日本軍官。可是我對日本軍人過去作爲與思想的線路，却永遠不能不耿耿於心。

民國三十一年十一月，我在重慶發表過一篇文章：「日本在戰術思想上的錯誤。」過了六年，三十七年七月十一日，我在台北的新生報又寫了一篇：日本在戰略思想上的錯誤；這篇文章很長，從日本在遠東的地位，日本的領導人物，日本軍人的起源及其性格，一直寫到日本在戰術思想上及戰略思想上的錯誤。

當時雖然還沒有締結雙邊和約，可是戰爭結束却已三年，我認爲日本在戰略思想上所犯的錯誤，其影響於遠東的局勢，還漫無止境，真是不幸而言中。